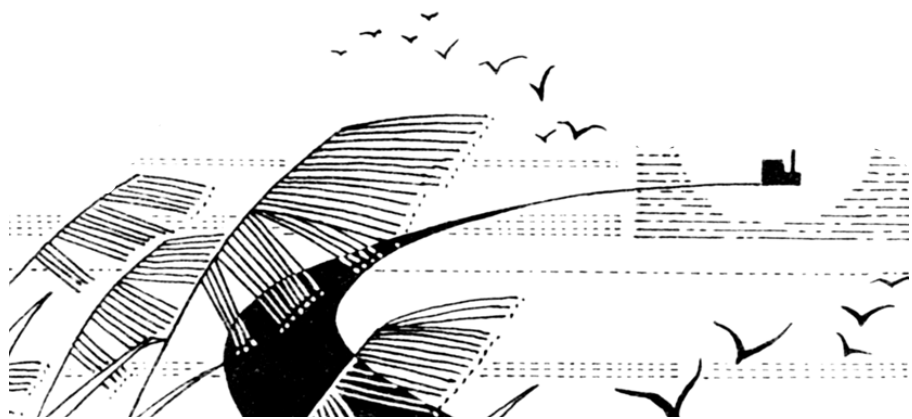


语言学论丛
(一)

马敏
主编



目 录

汉语小史	1
第一 上古汉语	1
第二 汉语的早期南下	2
第三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3
第四 黄金时代的中古汉语	4
第五 客家民系与客家话	7
第六 近代北方话的出现	8
第七 北京话地位的确立	10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	11
亲属语言和语言的谱系分类	18
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	21
世界诸语言	22
南岛语系	31
蒙古语族	36
蒙古语族各语言的远近关系及历史比较	38
罗曼语族	40
国际辅助语	42
神经语言学：形态分析与模仿	45
神经语言学：检定语言模式和心锚	50
神经语言学术语导读的行动	59
神经语言学概要导读	74
应用语言学	86
三都水族古老文字	95
商周秦汉汉字发展沿革谱系研究完成	96
她它是刘半农发明的吗？	97
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水书流失严重	98
水书是水族人的百科全书	99

籀文	100
中国诸民族文字	101
古文字学	109
篆书	128
外语教学	129
少数民族汉语教学	136
聋哑盲语言教学	139
词典学	145
微软重点实验室	151

汉语小史

第一上古汉语

目前一般认为，汉语和藏语是同源的，证据很多，比如这些同源词：目（眼睛）——Mug；手——shiang；脂（脂肪）——tsil；颈——skei；指（指头）——mzub；心（粤语）——sem；膀（臂膀）——Boang……汉语和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分离大约在 5000 年前（现在还有说法是汉语和印欧语同源，但没有成为主流说法，暂且不论）。

由于文献的缺乏，汉语上古音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材料是《诗经》和谐声字。《诗经》的时代前后拉得很长，大约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春秋中叶，共有五个多世纪。诗三百篇只有少数作品可以考见创作年代，其中最早的作品可以算是《豳风·破斧》。诗中提到的周公东征是公元前 11 世纪的事。最晚的作品也许是《陈风·株林》，这首诗说到陈灵公和夏姬的暧昧关系，这事在《左传》宣公九年和十年有记载，发生在公元前 600 年或前 599 年。《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证明春秋时期中原汉语存在着方言分歧。正因为有方言存在，所以当时流行类似于清代官话那样的雅言。《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字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带的古名。所以当时的官话即是王畿一带的方言，也即是周室所用的语言。士

大夫所作的诗和外交场合上所用的语言都是雅言。当时的外交场合常常有赋诗言志的事，所以各国的士大夫不仅都会做诗，而且大家在诗中所用的语言必须相同才能相互言志。在朝、聘、会、盟等场合也必需有一种统一的语言。雅言对于周天子与各国的联系和各国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当时或后来的经典著作也都是用雅言写的，如《易传》、《论语》。《诗》三百篇虽然是各地民间的诗歌，最初当然是用各地方言传唱的，但是后来编集时却是经过士大夫整理加工的，所用的语言是统一的雅言。正因为《诗经》的语言内部有同质性，所以今天我们研究《诗经》的语音系统，仍然发现三百篇的韵部系统是一致

的。比如《商颂·长发》二、六章诗里拔、达、越、发、烈、截、钺等字都是韵尾收-t。类似这种入声韵按不同发音部位相押的例子是《诗经》中普遍存在的。

第二汉语的早期南下

春秋-秦汉时期汉语在中原同化了东夷、山戎的语言，向南也越过了长江，开始呈现出今天汉语地理分布的初步面貌。楚人在春秋晚期便汉化，此后便被视为华夏一员，屈原的《楚辞》虽然带有楚地方言特色，和《诗经》音系的一致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春秋时期汉语也开始进入吴越两国的上层人士，而真正的汉化动力却是移民，西汉末年的动荡使得大量中原人南下江东。江东在汉人大量涌入之后势必使得种族比例发生变化，土著的越人成为少数，并且也在汉化之中。东汉初会稽人袁康写作《越绝书》时对当地越人的语言已经不甚了了，比如，

对《越绝书》的绝字，同书里先解释成称颂句践能绝恶专功，后面又解释成微言大义绝止于此，‘无能复述’，而据上海师范大学的潘悟云教授认为‘绝’当从古越语来。绝字上古音是 dzod，后者恰与泰文 cod[tsot]相近，cod 正是记录，记载的意思，《史记集解》引本书作《越录》，《北堂书钞》引本书作《越记》，越录越记恰是越绝的译意。可见到东汉时期，三吴（吴、吴兴、会稽）为中心的太湖 - 宁绍平原已经是汉语的天下，尽管山越仍然活跃在浙南和皖南地区。而随着秦军对岭南的征服，汉语自然随着汉人进入了两广和北越，但是在这个时期，汉人仍然只是集中在一些城镇，百越土著仍然有很强的势力。福建的情况又有些不同，秦代虽在浙南、福建地区建立闽中郡，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证明秦代曾经移民或设县于闽。直到西汉后期，福建才有冶县（今福州）出现，说明已有少量移民由北南来。但是闽方言的形成应该后推至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这一时期，来自江南浙北的移民分别从海路（以福州为中途港）和陆路（经浦城）大批涌入福建。沿海地带相继新设了罗江（福鼎）、原丰（福州）、温麻（霞浦）、东安（泉州）、同安五县，在闽西北则以现了汉兴（浦城）、建安（建瓯）、南平、建平（建阳）、邵武、将乐六县，形成了古闽方言的基地。今天的闽方言保留了许多上古汉语的特点，比如舌上归舌头（田陈同音——与陈完田氏代齐有关）。相信和这次移民来到以及福建地理上的偏处一隅有关。

第三 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五胡乱华，永嘉南渡，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阿尔泰

语系诸民族的南下对中原汉语造成第一次冲击，大量少数民族的涌入，虽然没有动摇汉语的地位，却相对削弱了北方汉语的强势，大量汉人的再次南迁使得南朝的金陵成为和洛阳并列的文化中心，北齐人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已经认为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300年分裂的结果是，江南的核心地区完全成为汉语区（今天浙南的畲族系唐代从岭南迁来而且也主要使用客家话）。而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最终同化于汉语但留下了若干残迹：比如魏晋以前只称兄没有哥，哥是阿尔泰语词。

第四 黄金时代的中古汉语

就像隋唐被认为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顶峰一样，这个时代对汉语也堪称黄金时代。今天我们所说的汉语方言，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乌鲁木齐到上海，都可以和中古音系建立起紧密的对应关系，这主要归功于《切韵》（和《广韵》）以及科举制度；随着中华帝国的盛名远播成为整个东亚的文化中心，汉语大大丰富的朝鲜、日本、越南的词汇，同时也出口了大批中古汉语的语音。

我国现存最早的韵书是隋代陆法言编撰的《切韵》。《切韵》成书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用平、上、去、入声分韵，共193韵；按反切的发声分音；《切韵》最大的价值是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惜这部书也早已散佚。《广韵》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韵书。它完整而详细地记录中古的（从隋唐到宋末）语言系统，今天的学者可以依据《广韵》确知中古语音的声母、韵母及声调情况。另外，作为韵书，

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一直起着供文人写作诗文查找韵字及辨析字音、字形、字义的作用。《广韵》分 206 韵，比《切韵》增加 13 韵。虽然增了韵数，语音体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增加的韵只是把某些包含两个韵母的韵析成两韵。这两部韵书，通过科举规范了全国的语音，因为科举的诗赋需要严格按照韵书押韵。这些韵书普遍使用了反切的注音方法，所谓反切通常用两个汉字来标注另一个汉字的读音。所使用的两个汉字，前者称为反切上字，后者称为反切下字。被切字的声母和清浊与反切上字相同，被切字的韵母和字调与反切下字相同。这实在是现代的录音技术出现以前最有效的识读汉字的方法。比如三是苏暂切，今天的闽粤方言把三读成 sam，苏沪的吴语读成 s ê，老南京话读成 sang，北京话读成 san，不同的读音却都符合本方言内苏暂切的念法，同时显而易见

见它们和中古音 sam 的紧密的对应关系（闽越方言保留 -m，吴语鼻音脱落，老南京话只有 ng 一个鼻音韵尾、北京话 -m 并入 -n）。

越南语、日语和朝鲜语这三种语言在语言学上的系属还没有最后论定，但是这三种语言曾受汉语的极大影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它们在历史上，甚至直至今天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汉字的字形和读音，以至语言学上把这三种语言中受汉语影响而产生的成分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这种所谓域外方言是中国文化扩散到这三个国家的重要工具。由于中国文化跟这三个国家的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许多学者把它们划入所谓中国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中。

越南语也有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汉越语只在文言里

占优势。汉语的文白异读大多是同一个字，读音不同反映语音的历史层次不同。越南语里的一个概念往往在文言里用的是汉越语，在白话里用的是非汉语来源的词。如文言(汉越语):六 luc6、难 nan1、见 kien5;白话:六 sau5、难 kho5、见 hey3。汉越语可以说是唐代之后在今越南地区实行科举制度的结果。科举制度促使知识分子诵读汉文的经典、书籍，其结果是大量汉字及其字音的输入，生成系统的汉越语。当时的越南地区文人掌握汉字和汉语的熟练程度并不亚于内地汉人。如唐德宗时日南人姜公辅曾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所著名篇《白云照春海赋》还被编入《全唐文》(卷四四六)。科举制度带来汉越语，也带来大量汉字。汉文化又凭借汉字作为媒介涌入越南地区。中国的儒教、佛教和道教也完全是借助汉字传播到越南的。事实上在十三世纪之前越南官方的一切文件和书籍、诗歌、文章等都是用汉字记载的。

七世纪时朝鲜的新罗时代开始产生一种被称为吏读的汉字，这是一种汉语朝鲜语混合的文字，字形采用汉字，实词多直接用汉字写出，虚词只用汉字记音，语法则仍用朝鲜语系统。吏读这种混合的文字自然把汉语的影响带进朝鲜语。在朝鲜语的一些读音(习称高丽音)中人们还可以看到古汉语读音的痕迹，这些所谓高丽音也就成了构拟上古汉语语音的重要依据之一。如高丽音:三[sam]、方[pang]等均与古汉语相合。随便说一句，现在韩国规定，对1911年以后的中国人名使用普通话的音读，对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人名仍使用韩国汉字音，所以，我们在《黄山伐》里可以听到把苏定方念成[su][ding][pang]，相当接近唐代汉语发音。

至于倭国，日语中的汉语词汇虽然也是外来的，但是因为传入的年代久远，并且早已在日语中扎根、融合，一般日本人已不当它们是外来词了（这与韩越不同，韩越民族主义兴起就废除汉字，倭国就是在中日战争时也没有出现过汉字是支那传来的应该废除的论调）。日语中汉语词汇的读音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吴音、汉音和唐音。这三个系统的不同是由于传来的地区和传入的时代不同而形成的。吴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以前的南方语音的，汉音是模仿唐代中原一带语音的；唐音是模仿宋、明、清时代的语音的。上述三种读音中吴音和汉音所占比重差不多，唐音只占少数，可见在唐代及唐代以前，日本和中国文化交流是相当频繁的。

第五 客家民系与客家话

大唐帝国盛极而衰，八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骚动了整个北部中国，再度迫使北方人民大规模向南迁移。《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豫南鄂北）百姓、两京（长安、洛阳）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节度使。这说明在湖南方面，唐中叶移民比西晋末年移民走得更远，前锋已到达湘资流域；规模也更大，以至从湖北江陵到湖南常德一带的移民数量竟十倍于土著。如此大量的移民必然带来北方方言的巨大冲击，从而取代了荆南地区的固有方言，而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同时湘资流域下游的湘语也受到北方话的影响而淡化。

与此同时，江西地区也接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代下半叶全国户口普遍减少，

唯独江西鄱阳湖地区和赣水中游地区户口大增，这种反常现象显然是由唐中叶移民引起的。以饶州（今上饶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开元年间有户一万四，到百年之后的元和年间户数增加到七万左右，净增四倍之多。对照当时户口普遍减少的现象，北方移民与土著比例远超过四比一之数。洪州（南昌地区）、吉州（吉安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户口增加。

中唐以后这样大量的北方人民进入江西，使中唐以后这样大量的北方人民进入江西，使赣客语基本形成，而且随着北方移民逐步向赣南推进，赣客语这个楔子也越打越深，不但把吴语和湘语永远分隔了开来，而且把闽语限制在东南一隅。唐末以后随着黄巢起义的影响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则更扩大了各地之间的方言差异，汉语方言地理的宏观格局至此已经基本形成。宋代以后的移民活动只是对这一格局进行局部的修正和调整，而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动。

第六 近代北方话的出现

北方话作为一个整体方言的概念是到宋代才在史籍上出现的。从先秦经典到汉扬雄《方言》、晋郭璞《方言注》，在述及方言的地域时都不是把北方话当作一个单位来看的，而只是把北方话分成好些块，分别加以讨论的。陆法言《切韵序》提及北方方言的三个地域是：燕赵、秦陇、梁益，陆法言是站在汴洛方言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所以实际上当时的北方方言至少有四类：即燕赵（相当于河朔）、秦陇（相当于秦）、梁益（相当于巴蜀）、汴洛（相当于中原）。这说明北方内部分歧还很大，一般人

还没有形成北方话这个概念。到北宋沈括才首次提出北人音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开始意识到北人音可以作为一个单位提出来讨论。宋金时期北方话的分布大约北至长城（长城以外只有少数的汉人居民点）；西北至沙州（今敦煌一带），那是古代边防要塞和丝绸之路的必经路口；西与吐蕃为界；西南则今广西、贵州、云南一带仍是少数民族语言占绝对优势。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官贬柳州的时候，曾作《柳州峒氓》一诗，从中可以看出柳州一带语言的使用情况：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缘荷包饭趁墟人。鹅毛御腊织山 X，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诗中所谓峒客显然是少数民族，他们的风俗习惯和语言都是跟汉人不同的。从汉人跟他们通话往往要重译（用不同的语言几经翻译）来看，当地的少数民族是杂居的，语言很复杂。

到了 14 世纪时期，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标志着近代北方话的成型。虽然名字叫《中原音韵》，实际上却不是中州音，就像周德清在序言里说一样，惟我圣朝，兴自北方，记录的实际上是元帝国大都的音系。它可说是新汉语，最大的语音变化就是入派三声，自南北朝时期沈约发现汉语的音调之别并定出四声以后，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就成为分辨四声的口诀（平上去入各以声母清浊分阴阳，实有八调）。而正是从《中原音韵》开始，入声在北方话中开始消失，逐渐无规律的散布到平上去三声里去了，故此，今天普通话的四声已经和传统的四声不同，分别是 1 阴平、2 阳平、3 上声（实际是阴上）、4 去声。词汇上这、那代替彼、此，我、你、他取代吾、汝、渠，

我们、你们、他们的出现，也是在这个时期以后。

第七 北京话地位的确立

蒙元百年而亡，明朝改大都为北平，建都于南京。有明一代，科举用韵为平水韵，这是一个反映中古语音，距离当时实际语音非常远的音系。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来看，此时的官话乃是南京音（澳门神学院院长）指派庞迪我神父……随同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去。庞迪我神父来自托莱多（Toledo）省。（页 378）庞迪我神父和两位修士钟鸣仁和游文辉则要陪同利玛窦神父前往北京。（页 383）正在此时，一位身居要职的太监率领六艘马船载着丝绸，正要动身去北京。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在这样一艘船上分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页 384）负责马船船队的太监在临清停下来，前往拜望这个收税官马堂。（页 388）负责远航队的太监高高兴兴地乘船走了，并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孩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纯粹的南京话。洋人到北京，目的就想在中国首都，在皇帝的身边长期居住、传教，他必得学中国话，而一直在北京深宫的操道地中国话的太监却要洋人以南京的男孩为老师，学纯粹的南京话，南京话地位之重要，足见一斑。满洲入关之初，北京话地位也并非一日升天，清世祖福临就觉得京城之音独遗入声，颇有点不满意，南京话顶着中原雅音之名，一直在北京的皇宫里作为官方标准语使用到乾隆十七年；清初倡导国语骑射，此国语乃满语，而非汉语。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满人的汉化，满语日渐势微，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旗人聚集北京，

自然逐渐改操京腔，派驻各地的驻防八旗也渐以京腔作为区别当地人的标志，北京话逐渐成为官场通用的官话，另外清代规定太监入宫先需习得京腔，对照《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描述可以确认北京话的地位重要。它的共同语地位也在清代中后期确立了下来了（在日本到 1876 年才确定把中国语从南京语改为北京语）。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属于粘着语，内中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等。各语族中虽然涵盖多种不同的语支和方言，但是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这些语支和方言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征。通过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间语音特点的比较，可以揭示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之间的亲属关系。

1. 阿尔泰语系的由来及其发展变化

19 世纪 30 年代，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又将其分为芬兰·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突厥语、满洲—通古斯语 3 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征，具有亲属关系。因此，将这 3 种语言归为一个语系，称之为阿尔泰语系。

阿尔泰语系诸语言都是从一种语言——阿尔泰原始语继承发展而来的，只是在继承的过程中形式有所变化，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么，阿尔泰原始语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阿尔泰这一名称，源自蒙古西部、中蒙边界交界处的阿尔泰山脉，这里是阿尔泰原始语的起源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瞩目的成果。例如，蒙古学家 G·J·兰司铁认为，朝鲜语也属于阿尔泰语系，因为朝鲜语中也有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某些语法特征。关于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的相互关系和分化的先后次序，蒙古语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目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蒙古、满洲人的祖先占据原始语言区的北半部；突厥、朝鲜人的祖先占据南半部。在这一语言区里各个部落的分布状况为：北部为满洲—通古斯人，西部为蒙古人，东部为朝鲜人，南部为突厥人。其中，朝鲜语同满洲—通古斯语最相近，而满洲—通古斯语的语音接近于蒙古语，突厥语在语音方面与其它语言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别。原因有二，一是突厥语很早就脱离了其它语言；二是突厥语在语音方面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变化。朝鲜语由于受汉语影响较早，其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可以认为，在大量汉语借词进入之前，朝鲜语就从共同体内分化出去，而其它 3 种语言还在一起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朝鲜语是最先分化出去的；接着古突厥语分离出去。蒙古语和满洲—通古斯语在一起继续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分开。总而言之，这 4 种语言的分化，先后顺序不同，并且吸收了不同的语言成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是它们都是源于阿尔泰语言统一体。

2. 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概况

2.1 蒙古语族

13 世纪初，蒙古族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统一诸部落，建立了早期的封建国家。随后便率领蒙古军队东征西讨，疆域曾横跨欧亚，且其子孙在中原建立了统一的

王朝——元朝。因此，蒙古族各部落亦散居各地，所使用的语言也随之带到了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方的语言形成了各自的语言特点，即产生了许多方言。因为它们都源于同一种语言——蒙古语，故将其称为蒙古语族。蒙古语语言的历史，一般分为古代、中世纪、现代三个时期。12世纪以前的蒙古语称为古代蒙古语，13世纪至16世纪的蒙古语称为中世纪蒙古语，17世纪以后的蒙古语称为现代蒙古语。而蒙古语书面语的历史分期与之不同，一些蒙古学者将书面语分为前古典蒙古书面语(17世纪以前)和古典蒙古书面语(17世纪至今)。

蒙古语族包括9种方言，即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戈勒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和保安语。

1) 蒙古语，指居住在我国及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蒙古语是蒙古语族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最具代表性。现在我国境内的蒙古族所使用的语言为传统蒙文；蒙古国境内所使用的语言为新蒙文，即1941年进行文字改革采用基利尔字母书写的蒙古语，一般称之为新蒙文或喀尔喀蒙古语。

2) 布里亚特语，指布里亚特族所使用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前苏联布里亚特地区和贝加尔湖地区。

3) 卡尔梅克语，指居住在前苏联的卡尔梅克族所使用的语言，分布在伏尔加河下游右岸、里海低地的卡尔梅克地区和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

4) 达斡尔语，指我国达斡尔族所使用的语言。达斡尔族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嫩江支流一带，另外还有几千人居住在新疆的塔城县。

5) 莫戈勒语,指阿富汗的莫戈勒人所使用的语言。它是一种正在消亡的语言。莫戈勒人现大多改用波斯语。

6) 东部裕固语,指居住在我国甘肃省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一部分裕固族所使用的语言。

7) 土族语,又叫蒙古尔语,主要是我国青海省的土族人使用。土族人自称察罕蒙古,意为白蒙古。

8) 东乡语,指我国东乡族所使用的语言。东乡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西、南、北四乡中的东乡,故称东乡族。

9) 保安语,使用保安语的是我国的保安族和土族。保安族主要居住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土族主要居住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

2.2 满洲—通古斯语族

满洲—通古斯语族分为两大语支,即南支(满洲语支)和北支(通古斯语支)。南语支包括6个语种:

1) 女真语(女直),是已经死亡的语言。在历史上蒙古兴起时,女真语仍然被使用,直至明朝(1368~1644年)。最重要的文献是《华夷译语》(女真),编于16世纪,书中包括女真文和用汉字标写女真文的内容。它接近于满洲语,可以认为是古满语或满洲语的方言之一。

(李盖提:《对女真小字解读的初步看法》,载《匈牙利学报》,1953年,第211~238页)

2) 满洲语,1644~1911年我国清朝所使用的语言。现在使用满语的人已所剩无几,主要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索伦人、达斡尔人和满族人。

1599年,他们用当时的蒙古文字试着书写满文;1632年加以改革,增加了几个字母。(奥斯汀:《满语的音位和形态音位》,1962年,第15~22页)